

## 西域历史与文物·敦煌学笔谈(栏目主持 施新荣)

# 敦煌学百年: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编者按:一个世纪前,敦煌藏经洞被王道士发现,由此敦煌文书流散世界各地,产生了一门世界性显学——敦煌学。走过百年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资料的刊布也已基本完成。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对敦煌学研究的历史进行回顾,客观地分析其研究现状,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以推动敦煌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我们邀请5位国内外敦煌学研究专家,以敦煌学的发展趋势为议题组织本组笔谈。程喜霖先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敦煌学理论,同时根据自己多年研究实践经验,指出“二重证据法”仍然是适用于敦煌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赵和平先生提出继续重视基础性的文书整理和石窟考古报告的出版同时,要在佛教文献研究、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并积极开展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日本学者关尾史郎先生认为,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比较敦煌与吐鲁番两地基层民众在信仰、葬俗等方面的异同,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而且要注意利用近年吐鲁番、库车等地出土的新资料。李锦绣先生认为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既可以推进内陆欧亚学一些课题的研究,也可以推动敦煌吐鲁番学的深入发展。马德先生结合近年自身的研究工作,以“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为例认为,敦煌藏文文献、佛经和佛教文献的研究大有可为,用敦煌文献研究敦煌以外的吐蕃历史文化前景可观。

关键词:敦煌学研究;历史;现状;发展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09)02-0096-17

## 试论敦煌学理论与研究方法

程喜霖

(湖北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2)

### 一、关于敦煌学理论

1900年6月22日,湖北麻城人王圆箴在莫高窟,一个偶然的机缘发现了藏经洞(编号17窟)敦煌文书重见天日,揭开了中华民族已湮没的西北古文明的面纱。自文书面世至今已108年了,敦煌文书流落世界而兴起了一门显学——敦煌学。然而敦煌学是不是一门学科?学者有不同看法。1985年8月,我参加在乌鲁木齐举行的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会议,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讲演称:“严格地讲敦煌学不是一门学科,而称敦煌研究为好。”但大多数学者仍认为敦煌学是一门学科。即使如此,敦煌学究竟产生于何时呢?有的认为1900年6月22日,藏经洞发现是敦煌学的发轫;有的欧洲学者将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窃掠藏经洞文献的时间作为

敦煌学之始;有的说敦煌学产生于1909年,还有的学者则将1930年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提出“敦煌学”概念,作为敦煌学诞生的时间。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因此,当前迫切需要研究敦煌学理论,第一必须深入研究敦煌学术史。

我以为大凡称为“学科”有其必备条件:“一是学科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二是研究对象、内容及基本资料;三是研究队伍和研究机构;四是有一批体现学科体系的论著”。依此,综观当前敦煌学发展态势,仅敦煌学术史有所研究,而敦煌学理论与方法几近空白。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育人。学科的发展,如同育人。唐人有云:“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可划分为婴儿期(诞生至三岁)、童年期(四至十五岁)、少年期(十六至二十岁)、成年期(二十一至五十九岁)、老年期(六十以上)。我们考察敦煌学的发展期,可从其发展的标志性年代为切入点,是否可以说,1900年6月22日,藏经洞文书面世,敦煌学如胎儿在敦煌母体中孕育着,是敦煌学的雏形期,为萌芽发轫阶段;由于敦煌文书流散世界,经三十年研究于1930年,敦煌学如

呱呱坠地的婴儿诞生了,为敦煌学的形成期,即形成阶段,所以此时,前揭陈寅恪文提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又经50年研究到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成立,是敦煌学童年期,为敦煌学初期发展阶段;再经过30年发展,2000年6-8月,中外敦煌学者在北京、敦煌等地举行藏经洞发现百年大祭国际学术会议,敦煌学茁壮成长成为少年期,盖世界一门显学,迈进中期发展阶段。可以说,今天的敦煌学尚没有到成年期,它还不成熟,远远没有达到高度发展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在2000年说:“敦煌学还要再搞一百年”的道理。概而言之,敦煌学发展分为雏形期(萌芽发轫阶段)、婴儿形成期(形成阶段)、童年(初期发展阶段)、少年期(中期发展阶段)、成年(熟)期(高度发展阶段)。我以为当前敦煌学研究状况尚未成熟,仍处在中期发展阶段,敦煌学者仍须努力拼搏将其推进到高度发展阶段,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以上我粗略划分了敦煌学的发展阶段,见人见智,聊备一说而已!所云发展阶段,当是敦煌学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敦煌学发展史的研究不乏佳作,如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刘进宝《敦煌学述论》、郝春文《二十世纪的敦煌学》、柴剑虹《敦煌学与敦煌文化》,凡此皆是敦煌学入门的代表作。然而从整体而言对敦煌学形成发展的规律升华理论的高度,仍然是初步的,比如敦煌学究竟如何划分阶段,各阶段的发展的特点,其代表著作是什么?又如何从发展阶段揭示敦煌学形成发展的规律,尚待深入探讨。

第二,敦煌学理论一个重要问题是敦煌学的定义概念,何谓敦煌学?敦煌学的内涵与外延。

这是敦煌学者无法回避的课题。学术界的看法歧异很大,前揭陈寅恪文提出“敦煌学”概念,而其高第周一良又著文称:“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姜亮夫先生提出敦煌学的“内涵”是研究敦煌地区“石窟之造型艺术”、敦煌文书、简牍、长城及烽燧遗址等等,都是敦煌学研究范畴。林家平等先生认为敦煌学内涵

“三个层次”,即敦煌地区文献资料、文献文物整理与研究、学科理论。刘进宝先生则云:“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以上具引了有代表性的四种观点,显然第一种观点认为敦煌学不是一门学科,后三种都承认敦煌学是学科,但研究内涵有很大差异。姜氏侧重研究对象广泛,林、刘二氏提出敦煌文献及敦煌学理论为研究内涵。关于敦煌学的看法还有其它说法,在此不一备举。总而言之,关于敦煌学概念是不定式,异常模糊,在学界争讼不休,究竟孰是?是值得思考的。余不揣冒昧提出一种看法:所谓敦煌学是研究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母体与域外文化(含外来文化及周边胡文化),在敦煌地区碰撞、交汇、升沉、积淀而形成的敦煌文化及其与域外文化关系的学科。因研究对象多元、内容广泛,它又是由敦煌文献学、敦煌考古学、敦煌历史学、敦煌文学、敦煌地理学、敦煌语言学、敦煌艺术学、敦煌民族学、敦煌宗教学、敦煌民俗学、敦煌科技等分支学科组合成的综合性学科。由是其特点可概括为三端:

其一,地域性。著名敦煌学家王永兴先生《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称:“法国伯希和从我国敦煌掠去的古文书里,有唐代敦煌几个乡的登载男子姓名的4件文书残卷。这些文书记载了几个乡不同户等的小男以上男子的姓名、年龄、类别(小男、中男、白丁、老男、勋官等),还记载了大多数人担负的职务或徭役的名称”。“这些文献的地域性是很明确的,有几件文献上有敦煌县印,有一件文献上还标明从化乡,从化乡是敦煌十三个乡的一个。其次,4件文书记载的几百个人名里,以阎、张、索、曹、安、史、阴、令狐、汜、石、康、何、罗等姓最多,这是敦煌地方的一个标志”。充分说明这些卷子记载的人和事皆是敦煌的,无论敦煌文书流落何方,学者用来研究何种问题,都无不打上敦煌的印记。因此,王先生在研究唐代差科簿时冠以“敦煌”二字。这篇著名论文既是唐史研究课题,又是敦煌史学的一部分。显然敦煌学诸种分支学科具有浓郁的地域性是不争的事实。

其二,交汇兼容性。柴剑虹先生有云:“儒学主流文化与各种外来文明融汇交流,佛、道、祆、摩尼

等宗教兼容并蓄”。它具有“多种文明交汇而持续、稳定发展的特性”。“敦煌两千多身彩塑中既有清晰可辨的犍陀罗、马土拉风格,又有在魏晋时代风行一时的秀骨清像和在盛唐时期类似宫娃的丰腴菩萨”。我们知道,印度佛教沿丝绸之路东渐经龟兹、于阗、高昌至“华戎所交”之敦煌,在历史的长河中改造成汉传佛教,敦煌就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地区之一,乃敦煌学交汇兼容性的实例。

其三,综合性。敦煌学因研究对象多元就决定它综合、交叉性的特点。前揭姜亮夫文将“高昌一带文物”归于敦煌学范畴值得商榷,但说敦煌地区千佛洞石窟艺术、“文书”、“简牍”、长城、城堡、烽燧等遗址为敦煌学研究对象是有道理的。换言之,敦煌学研究对象多元就派生出诸种分支学科,造就它综合性特色。又如敦煌史学运用敦煌文献研究本地区历史、西北区域史、唐史、宋史在整体上统属中国史学。那么,它又与敦煌文献学、简牍学、金石学等学科交叉,又敦煌学与吐鲁番学、藏学、西夏学互交叉更是不争的事实。凡此反映了学科的交叉性,也可以说这是综合性学科派生出来的。总之敦煌学的综合交叉性与单体学科是有区别的。

如上所论,敦煌学的定义概念是抽象的,而其诸种分支学科则是将敦煌学具体化。从理论上讲,多元最终归于和谐,表现出同一性,这种一与多从抽象到具体,正好反映了敦煌学综合性的特质。

第三,敦煌学者必须认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之间的关系,探讨敦煌学形成发展的逻辑演进,研究其逻辑推进的轨迹,从理论上揭示敦煌学的发展规律,也是敦煌学理论研究的课题。

第四,研究理清敦煌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联以及与其周边地域特色的学科,如吐鲁番学、藏学、西夏学、于阗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

第五,敦煌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敦煌学的学术规范、学术评论、学风与文风。如所周知,在学术界,文学评论、文艺评议异常活跃,史学评论次之,相形见绌,敦煌学评论少之又少。有位英年早逝的友人黄约瑟博士云:“学术工作者花上一段时间写成和出版了论著,理应得到同行的回应和反响。出版并不是学问成果的终结而是开始,而评论除了在赏识作者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外,更应该加以

学术性的衡量,或与同类著作相比,以便读者明白书中内容的重要和价值。放眼世界,任何取得成就的学术领域中,必有其评论传统,具发扬和监察学术的作用”<sup>⑩</sup>。

我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07年度理事会(武夷山)上,宣讲了《学术规范与书评》,就是呼吁“发扬和监察学术的作用”。可是当前敦煌学界每年论著数以百计,其质量良莠不齐,更有沽名钓誉或为生计捞奖捞职称者,急功近利炮制文章。因此公正的学术评论规范和监察敦煌学的健康发展,已提上日程。当然学风与文风,治学严谨,特别是“严谨”二字是学者的学术生命,也是敦煌学者应当注意的。

第六,敦煌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即方法论研究是敦煌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

如上所述六端,为敦煌学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亦聊备一说而已!

## 二、敦煌学转型与中层理论

自2006年一次以“转型”为中心的学术讨论会后,敦煌学转型成为热门话题。方广钊先生云:“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似乎敦煌遗书大多已经公布,新资料已经很少了,各自拿敦煌资料‘开展研究,这就是转型’。”“坦率地说,为什么要转型?怎样才能转型?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又称:“仅就整理文献而言,应‘扎扎实实地把资料工作做好,离所谓‘转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sup>⑪</sup>。我赞成方先生的意见,说实话,我非常费解,为何要提出敦煌学转型,也弄不明其含义?实际上转型概念是经济学常用的术语,如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建言:当今中国要“推动经济模式向内需转型”<sup>⑫</sup>。当然也有史家称唐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型时代,这里的转型仍是指唐宋之际经济、政治的变革,所以将唐宋称为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型,乃指制度而言。因此,转型概念是否适合一个学科如敦煌学的转型,是值得商榷的。前揭柴剑虹文云:“因此,这样做的结果,非但不会‘消灭’敦煌学,而且能为其先天不足的躯体补充丰富的营养,促进敦煌学科自身的发展壮大,使其真正巍然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所云“先



天不足”，也就是说，还没有发育成熟。这与前文所述，敦煌学处在少年期(中期发展阶段)相契合。换言之，敦煌学还不是成熟的学科，距成年期(高度发展阶段)还有一段距离。诚如季羨林先生所言，“敦煌学还要搞一百年”。所以即使要将“转型”理念引入敦煌学亦为时尚早！

2006年6月(武当山)敦煌学会理事会上，有学者宣讲“敦煌学中层理论”，引起与会者关注。所谓“中层理论”，追本溯源，乃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中层(又译作“程”)社会学理论”，它既不是宏观也不是微观理论，而是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社会学理论，故称“中层理论”。其核心是研究自然人进化为社会人的社会化过程的理论。这种美国社会学中层理论是否适合敦煌学呢？我以为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自己的背景，学科也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中国与美国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导致学科的学术背景亦千差万别。因此，将西方不同的学科理论简单的移植，由于土壤不适应是难以存活的。人们不是常说“本体论”吗？敦煌学植根于中国的敦煌。显然美国社会学中层理论不适合敦煌学。

一言以蔽之，“转型”与“中层理论”，不见得适合敦煌学。因为敦煌学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背景，诚如前揭柴剑虹文所言：“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弄清该学科的构建与其学术背景、学术渊源的关系”。也就是说，研究敦煌学理论应着力探索敦煌学内在的“构建”，即诸分支学科的构建和他们之间的关联以及相关的学科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

### 三、理论与研究方法

大凡一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如影随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是学科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由于敦煌学研究对象多元，形成诸多研究领域，造就多种分支学科合成为综合性学科，这样就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即各分支学科当有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譬如敦煌史学是敦煌学的重要内容，它又是中国历史学中唐宋历史、西北区域史的一部分。那么，史学理论方法论亦可用于敦煌史学研究。史学理论可用一句话说明：“唯物史观”，治史者又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其宏观理论指导

下派生出治史方法，可概括为思辨法(辨证)、考据法、实证法、推论法、计量法、比较研究法、二重证据法等等。毋庸置疑，敦煌史学必须用唯物史观来统帅，在研究中交叉运用上列研究方法。但是最适合的正确方法，却是“二重证据法”，盖敦煌史学独特的方法论。

关于“二重证据法”，我谈点意见。2000年6月，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讲：“敦煌文献为王国维创立‘二重证据法’研究古史提供重要依据”<sup>①</sup>。有论者则认为“二重证据法”，古已有之，如宋人就有运用者，用王国维的话说：“然则中国之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但他对此有一段结论性语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今日始得为之”<sup>②</sup>。也就是说，虽然“二重证据法”，古人有用之者，但是作为研究史学的一种方法论则是王国维创导的，“今日始得为之”也，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众所周知，文献始初意义乃指文字记载，献者指贤者论事。今国家定义：“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载体”。据此，文献分为存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大类。王氏所云：“纸上之材料”为存世文献，“地下之新材料”为出土文献。1900年6月22日，王圆箎开启藏经洞，5万余卷敦煌文书面世，接着吐鲁番出土文书、汉简(含敦煌简)、甲骨文相继发现，盖震动世界考古学的四次重大发现。国学大师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敏锐地发现新材料产生新学问。王国维指出：“自古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之赐”<sup>③</sup>。陈寅恪亦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sup>④</sup>。他们首先运用新出敦煌文献研究中古史，特别是王国维把近代西方思辨的方法，同乾嘉传统考据方法及古人曾使用过的以地下出土材料证明纸上材料的方法合一炉而治之，发明“二重证据法”，即把考古资料(敦煌文书、简牍、甲骨文、金石文等)与存世的历史文献典籍互为印证，揭示古史的全貌。王国维研究敦煌文书的贡献，柴剑虹有专文<sup>⑤</sup>，无须赘述。我仅扼要概述王国维最早

利用甲骨文纠正《史记·殷本纪》记载殷朝帝王、世系、称号的舛误,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朝“职官”、“户籍”、“田制”等论文和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等堪称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他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重大发明将史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他与罗振玉、陈寅恪研究敦煌文献的论著皆是敦煌学形成阶段的代表作。陈寅恪评价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有云:“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又称:“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託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sup>①</sup>。陈寅恪对王国维史学方法论的形成及贡献所论精审。又郭沫若称道:“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sup>②</sup>。可以说,正是20世纪初敦煌文书、敦煌汉简、甲骨文的发现,造就了王国维的历史方法论。反之,他发明的“二重证据法”为敦煌史学独特的新的研究方法,事实证明极大地推进了敦煌史学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陈寅恪高第、著名敦煌学家王永兴先生著《唐代敦煌差科簿考释》<sup>③</sup>,征引《唐六典》、《唐书》、《通典》、《唐会要》等典籍与敦煌天宝十载徭役文书所记互相参证,揭示唐代郡上、纳资、子弟、侍丁、亲侍丁、执衣、捉钱、充徕、渠夫、斗门、卫士、土镇、豆卢健儿、终服等徭役名色的内涵,将此文书科学定名为“差科簿”,纠正了原定名《丁籍簿》的舛误。王文是新中国建国之初,在敦煌史学领域最早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乃敦煌学初期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可以说,王文是敦煌学术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它在敦煌史学方法论上,影响了一代人。

20世纪80~90年代,出现唐长孺先生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王永兴先生主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韩国磐先生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等三部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高水平学术著作,也是运用“二重证据法”将典籍记载与文书互为印证,揭示唐朝政治、经济、军事若干重大问题,它是敦煌学中期发展阶段的标志性著作。在这些经典著作的昭示下,余著《汉唐烽堠制度研究》、

《唐代过所研究》,在方法论上当是运用“二重证据法”,把汉唐史籍记载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简牍互为印证,揭示烽堠、过所制度形成发展的规律。近来我著一组研究唐代杂徭的论文,仍是运用“二重证据法”,将文书与唐文献互相参证,重新诠释唐《充夫式》,试图解决杂徭征役日数问题。凡此等等皆证明,“二重证据法”盖敦煌史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综上所述,我们是否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及思辨法,可以统领敦煌学诸分支学科,这是共性,但各个分支学科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因此,每个分支学科又有适合自己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二重证据法”,为敦煌史学之方法论者然。从理论上讲,这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最终归于和谐。

#### 注 释:

- ①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 程喜霖:《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成立暨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感言》,《2006年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第89页。
-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郎中员外郎条。
- ②方广钊:《漫谈敦煌遗书》,《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3期,第207页。
- 周一良:《敦煌遗书论文集序》,北京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又见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 姜亮夫:《敦煌学之文书研究》,北京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 林家平等:《试论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及其特点》,《兰州学刊》,1984年第1期。
- 刘进宝:《敦煌学述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页。
- ③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又见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页。
- 柴剑虹:《注重敦煌学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关联》,《学术与探索》,2008年第3期。
- ④黄约瑟:《近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新史学》第三卷第三期,1992年9月。又见刘健明编:《黄约瑟隋唐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8页。
- ⑤陈志武:《中国用财政手段推动经济转型》,《参考消息》,2008年10月2日。
- ⑥程喜霖:《20世纪敦煌文献与古史研究》,载郝春文主编:

- 《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 ⑮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原载《国学月刊》第二卷,1926年。参见柴剑虹:《敦煌学与敦煌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2-63页。
- ⑯《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
- ⑰柴剑虹:《王国维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敦煌学与敦煌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3-65页。
- ⑱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 ⑳《光明日报》1999年7月5日第九版《世纪》第13期。

## 对未来我国敦煌研究的一些看法

赵和平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100081)

### 一、缘起

南京师范大学刘进宝教授是个有心人,他约集了一批我国在敦煌学研究上颇有造诣的学者搞了一个笔谈敦煌学,承蒙不弃,笔者也在刘教授罗网中,且多次催稿,辞不获己,只得勉强应命,却十分为难,若仅写笔者熟悉的“书仪研究”,恐失之过窄;若写国际敦煌学如何发展,又不是愚钝如我所能承担的;思之再三,只好就本人所知、所做、所想的一些事情和问题,写出一些真实想法,且不去管对错与否,只管真实就好。一是践刘教授之约,二是供同道与读者参阅。

在同行中,我戏称自己是“三无”人员,即学校内一无对口专业,二无学生(研究生),三无专题研究经费,乃敦煌学界的一名散兵游勇而已。但同时,我要感谢上苍给了我太多的机缘,使我至今钟情于敦煌研究而痴心不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被王永兴、张广达先生领进了学术之门,毕业后,又经宁可、沙知先生及邓文宽学长之荐,在先师周一良先生门下问学十七载,其中,80年代末,一良师去美国探亲,我又得经常向周绍良师请教,1998年底至1999年初在香港

中文大学饶宗颐先生处当了三个月学生,而从1985年开始,参与《敦煌学大辞典》的编撰工作,得以向季羨林先生、唐长孺先生、段文杰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及陈国灿、樊锦诗、姜伯勤、李永宁、李正宇、施萍婷、朱雷等诸位先进求教,从这些师长那里,我学到了做人的道理,也逐步进入了“敦煌学”的殿堂。在中国敦煌学的圈子里,邓文宽、方广錡、郝春文、黄征、荣新江、王素、张涌泉、郑炳林等又成为我在学术上的畏友和诤友,并从与他们的交往和阅读他们的著作中获益良多,在这样的学术生态中,你不好好干也难。因为你不努力去做,就无面目去见老师,更无法与朋友们交流,正是这种学术上的因缘,才使我这名游骑有勇气继续在敦煌研究的路上走下去。

以上两段多余的话似乎与“研究”二字无关,但从我国敦煌研究的历史上看却别有意昧。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先驱者们,正是凭着一种对学术的追求,克服重重困难,为我国的敦煌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50年代中,向达、王重民、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王庆菽等六教授所著《敦煌变文集》刊出,这是我国敦煌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正如向达先生在此书“引言”所说:“我们六个人都是用业余和会后的时间从事于这一工作的。有的人往往是午夜以后,还在那里丹黄杂下,不以为苦。”检阅一下目前的敦煌学学术史可以发现,1979年以前我国的敦煌研究多处于这种“业余”的情景(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和临摹除外)。

### 二、过去与现在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使我国的敦煌研究真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大陆的敦煌学者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果,主要有这样几点:

第一,专门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专职研究人员队伍壮大。

二十五年前,敦煌文物研究所是大陆地区唯一的专职研究和保护敦煌的机构,目前,它已扩展成研究院,并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敦煌石窟保护和敦煌学研究实体,人员达数百人。除敦煌研究院之外,吐



鲁番也成立了吐鲁番研究院,已形成规模。兰州大学成立了敦煌学研究所,并成为教育部文科研究基地(与敦煌研究院合作),目前已培养出数十名博士和更多的硕士。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兰州理工大学等都有专门的敦煌学研究机构。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也以敦煌文献的研究整理为主要方向之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都招收以敦煌研究为主的硕士、博士生。中国社科院有跨所的敦煌学研究中心,承担了院级重大课题。南京师范大学也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招收以敦煌学研究生为主的硕士、博士生。这里仅举出了部分机构和学校,即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大陆拥有一支相当数量的敦煌研究专业队伍。

除研究机构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后,在其资助下成立的三个资料中心,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和兰州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得到健康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些专门机构的成立,为敦煌学的发展从人员、设备、资料、经费上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 第二 敦煌学刊物和著作出版相对顺利。

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著作的出版一时称为“老大难问题”。只要翻翻那些年出版的敦煌学专著的“前言”或“后记”即可,无须烦言,随着社会的发展,敦煌学专著的出版相对来说顺利多了,仅以笔者有限的耳闻目睹来说,英藏敦煌文献除四川人民出版社已印出的汉文非佛教之部外,其余佛经部分的出版已在紧锣密鼓的筹划中;法藏、俄藏、北大藏、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上海图书馆藏、上海博物馆藏等敦煌文献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出,上海古籍出版社与西北民族大学合作在出版敦煌古藏文文献,浙江藏、甘肃藏敦煌文献也已刊出,可以说,除了数目不大的散藏外,大宗的敦煌文献(尤其是汉文部分)基本出齐,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相对而言,专业研究的敦煌学书籍出版也渐趋顺利,如江苏古籍出版社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1种13册);甘肃教育出版社的《敦煌学研究丛书》(12种)及《走近敦煌丛书》;民族出版社的《敦煌学博士文库》、《敦煌学研究文库》,甘肃民族出版社的《敦煌研究院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中华书局出版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等,这里仅举其规模较大者,单本和多本的敦煌学著作的刊布也较20世纪80年代顺畅了许多。就目前的出版大势看,只要有好的书稿,出版已不是难事,这对于敦煌研究的发展将非常有利。

### 第三 敦煌研究工作正在向纵深发展。

我们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敦煌文献的刊布也已取得重大进展,几种专业刊物(《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敦煌学》(台湾))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人员、资料、阵地均已具备,敦煌研究在此基础上正向纵深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启动,90年代末完成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和《敦煌学大辞典》,是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直接领导和组织的两项“工程”,也可以看作是20世纪中国敦煌研究的里程碑,在此基础上,我国的敦煌研究目前发展的状况如何呢?笔者仅举三例以说明之。

例一,郝春文教授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编)已经公开出版五卷,这部著作将英藏敦煌文献中非佛经之部逐件释录,目的是将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校订成为像《二十四史》标点本一样便于使用的可信从文本,虽然工作量很大,全部完成尚待时日,但这项工作正在扎扎实实进行,书正在一卷卷陆续刊出,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例二,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领导下的《敦煌文献合集》,拟将敦煌汉文文献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整理,目前已取得重大进展,书成有日。张涌泉与郝春文的工作虽然貌似不同,但都是耗时费力为敦煌研究打基础的工作。

例三,笔者在敦煌研究中,二十多年来集中于敦煌本书仪研究,基本上将敦煌本书仪的大部分做了分类录校整理,也写了一批研究论文,近几年来,吴丽娱据此进行的唐代礼制研究、史睿进行的礼制研究、张小艳进行的书仪词语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将敦煌本书仪研究引向深入。

当然,中国敦煌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例证还很

多,如林悟殊先生对三夷教的研究;如王卡、王承文、刘屹、万屹等对敦煌道教的研究;如许建平对敦煌经籍的研究;如冯培红对归义军官制的研究;如陈明对医药文献的研究;如余欣对“神道”的研究等等,不一而足。无论是总体还是个案上,我国目前的敦煌研究正在健康地向纵深发展。

中国官方语言中有两句话,叫:“成绩说够,问题说透”,要将“成绩说够”,非这篇小文所能承载,只是点到为止;而“问题说透”,更非此篇小文作者所能胜任的,所谓“问题”,也仅是对我国敦煌研究发展的点滴想法而已,遑论“说透”。

### 三、未来

2006年秋,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转型期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何谓“转型”?笔者理解,就是把敦煌研究推向前进,使研究更加深入,取得更多的学术成果。要“转型”,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注意:

#### 第一,重视基础工作。

如本文说“成绩”部分所言,敦煌汉文资料的大部分已影印出版,但“胡语”部分则刚刚开始,仍需努力。张涌泉、郝春文的工作正在进行中,盼其早日完成。更重要的一点是,多年来,学界盼望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早日面世,考古报告属于基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敦煌学深入的基础资料,因为没有坚实的一手资料,许多研究工作难以深入,为什么这么说呢?笔者从2002年起,即注意到莫高窟96窟、130窟的大像及榆林窟第6窟大像,想做一些相关研究,但时至今日,连一份有关大像各部分准确尺寸的资料都难以获得,使研究很难深入。

#### 第二,重视佛教文献的研究。

敦煌藏经洞中,90%以上为佛教典籍,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一直薄弱。其实,自清末民初起,我国的著名学者已将佛教与佛经纳入了研究视野。陈垣、陈寅恪、汤用彤先生更是在佛教研究上开辟了新天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继承好这一学术传统。中国的宗教,尤其是佛教,与政治关系密不可分。安公(道安)说:“不依国主,佛法难立”,武则天时,薛怀义等进《大云经疏》,九人赐“国公”,全国各地皆建大云寺,神会助平安史之乱,禅宗南能

一系则全国风行,政治与宗教关系可见一斑。另外,宗教不仅与政治有关,而且与普通民众生活密不可分,众多敦煌文献即是明证。

敦煌佛教典籍数量庞大,种类繁多,除入藏的经、律、论外,疑伪经占相当数量,这些“中国化”的疑伪经可研究的空间非常大,至于中国僧人所做“论”、“疏”、“赞”、“义”等等则更具中国特色,深入研究这些文献,无疑具有广阔的前景。

笔者对佛教、佛学基本上是门外汉,只是在学术研究上偶有涉及,不敢深入。前几年,我发现敦煌写经中咸亨二年(671)至仪凤二年(677)中的宫廷写七卷本《妙法莲花经》和一卷本《金刚经》,乃是武则天为其逝去的父母发愿所写,并复原了置于经前的两篇以武则天名义撰写的发愿文字。宫廷写经直接颁到敦煌,全国其余州县亦当如此,这该是多么大的影响!更深一步,深入研究敦煌所出佛经,可以看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什么时段以什么经典为主,什么时段官方提倡的是何种经典,这些经典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生活有何种联系等等,深究下去,一定会对佛教与中国中古社会的关系有深入的了解,一定会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中古社会的变动。其实,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活动》开了一个好的先例,沿着此路数走下去,将敦煌佛教典籍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做通盘思考,必定会有突破。

#### 第三,重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敦煌学”一词学界一直有不同看法,此不赘。但众多学者所认同的是,敦煌研究中已包含有历史、考古、宗教、艺术、科技等等众多学科的资料。敦煌研究,本来就应该把敦煌石窟、敦煌所出土文献及敦煌史地综合在一起来进行研究。可惜近代的学科划分过细,往往使研究者很难做跨多个学科的研究。笔者以为,解决的方法大约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各学科把基础研究做好,如石窟要有考古报告,壁画要有线描图,文献要有准确的释读等等;另一方面,研究者要开阔眼界,把不同学科中相互关联的资料做综合分析,虽然难度很大,却是我们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还是以笔者个人研究的体会为例,如敦煌写本中《老子》或《道德经》及其注疏本很多,若单从宗教观点看,说明敦煌陷蕃前,也曾



流行道教,换一个角度,唐代前期,《老子》曾经是科举考试中必考科目,他就成了与儒家经典相同的经书,成为读书人考试的必读书。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了《老子》及其注疏在藏经洞中存留较多的原因。究竟何者为主因,则要进一步探讨。再举一个更复杂的例子,武则天利用宗教、尤其是佛教为其当皇帝制造“政治气氛”,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大云经疏》、《宝雨经》、《华严经》的敦煌写本与莫高窟同时代的洞窟里《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宝雨经变》、《华严经变》的壁画有何联系?《大云经疏》、《宝雨经》、《华严经》的敦煌写本与莫高窟同时代的洞窟里的塑像间有何关系?与96窟、130窟弥勒大像及榆林窟6窟大像有何关系?再扩大而言,与现存我国西北的石刻与泥塑弥勒大像有何联系?深究下去,将历史、考古、艺术、宗教等做一综合的思考,将有新发现,这样做不是很有趣吗?

#### 第四 重视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敦煌自古即是“华戎所交一都会”,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所含内容中,中外文化交流是重中之重,自藏经洞发现之后,文物外流,敦煌研究开始即具有国际性特色。时至今日,敦煌在1987年被联合国列为我国第一批人类文化物质遗产,敦煌研究更具有鲜明的国际特色。西起欧美,东至日本,代不乏人,要推动新时期敦煌学的深入,开展广泛的国际学术合作是十分必要的。

自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以来,大陆地区召开的多次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有欧美、日本及我国港、台学者参加,而在英、法、美、俄、日、加等国及港、台等地区举行的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都有大陆学者莅临。近年来,中英、中法、中俄合作出版敦煌文献,中英合作的“IDP”(国际敦煌学项目)已经运作,2003年春,更是成立由中国(含台湾)、日本、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德国、哈萨克斯坦等国代表组成的“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委员会主要是协调各国敦煌学者的学术活动。我们中国学者应该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敦煌学界的合作与交流,以促进这个学科的长盛不衰。

其实,谈敦煌学的过去与未来,是一篇内容十分丰富的大文章,本文的主旨是立足于现在,即“路

在脚下”,又要放眼未来,即“路在前方”,脚踏实地,一步步将我国的敦煌学推向更高的阶段。

(附记:因为是“一些想法”,本文中提到的一些机构、一些人、一些著作、一些研究,可能有重大遗漏,排序也可能不尽妥当,选择更难说妥帖,只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绝无孰轻孰重、你先我后之意,至于“想法”,也只是一人之言,聊备一说而已,望同道及读者谅之。)

## 从吐鲁番文书看敦煌文物 及其地域情况

关尾史郎

(日本 新潟大学)

自从在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经洞)发现了大量文献以来,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几乎与敦煌文献发现的同时,人们还在其西面的吐鲁番发现了大量文书。但是,这些吐鲁番出土文书不是从石窟寺院发现的,而主要是从“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尽管出土情况不同,但是,都可以把它们作为原始资料看待,因此,无论是敦煌文献还是吐鲁番文书都得到了世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人们对敦煌文献和吐鲁番文书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开始尝试对它们的内外关系进行总结概括。然而,如果仔细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是石窟寺院的莫高窟所出土的文献、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出土的文书都可以作为原始资料来看待,但不能认为它们在史料价值上是完全相等的吧?尤其是从墓葬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几乎都是被葬者穿戴的冠、带及鞋等,偶尔也能发现作为纸棺等的素材而载有文字的纸片,这些纸片被裁断后又再被再利用,或者是反复再利用,才成了今天偶然残存的样子。与敦煌文献相比,吐鲁番文书大多是些断片而已,虽然研究不断,而一直很难取得进展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不过,要想把敦煌文献的史料价值彻底搞清楚也许是不可能的。与第十七窟的特点关系密切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以写经为中心的各种文献被收藏在如此狭小的石窟里面呢?目前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关于这个问题,也许今后还会有很多假说不断

地被提出,也许,人们似乎还会把分藏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的敦煌文献归类做出目录并判定真伪吧?然而,这里我们不想探究这个难题。这里要论及的仅仅是关于敦煌文献和吐鲁番文书之间的比较和整合的一点建议<sup>①</sup>。

无论是法制文献,还是户籍、契约文书以及社文书等,都是历史研究所不可或缺的贵重原始史料。而且,这些都是可以在敦煌文献或吐鲁番文书中找到的。在敦煌文献中,我们可以推断,这些世俗文件都是被贴在一起的,背面还写有经文,或者说是为了使用的目的而被保存下来了。这就是说,不适合做写经用纸的世俗文件几乎一点也没留下来。那么,我们之所以在敦煌文献中没有发现吐鲁番文书中所见高昌国时代的条记文书、唐西州时代的领抄文书之类的可以按照交付文书分类的20字左右的极小型文书,是不是因为它们即使贴在一起也不适合在背面做写经用纸呢?纳税者每当完成一次纳税行为时交付的文书,在本质上说当然属于租税制度的事情,而且对其相关的各种制度,例如,土地制度、村落制度以及这些制度背后所存在的基层社会的各种关系等等都是意义重大的原始史料,但在敦煌地方我们是无法通过交付文书找到研究线索的。不仅如此,也很难通过交付文书对吐鲁番和敦煌两地的制度和社会进行比较。

除了纳税交付文书以外,我们不得一开始就从敦煌文献中放弃寻找的是:仅仅在吐鲁番文书中才出现的、为说明墓葬情况而写的“随葬衣物疏”。顾名思义,这种文书从随葬品目录开始写起,然后写为被葬者镇魂的内容。这种风格从4世纪到7世纪中期基本是一贯的,只是有点微妙的变化。因此,它不仅是研究这一时期吐鲁番的信仰和葬礼历史发展的珍贵史料,也是人们研究的最多的一种文书。但是,就风格而论,在世界各地所藏的敦煌文献中是找不到类似例子的。仅仅在莫高窟北区新出土的文书中才有可能找到。为什么呢?在这些近年才开始进行认真研究的地区中,存在一种专门安置死者的窟,即“瘞窟”。而且,和墓葬规模相当的这种瘞窟已经被确认的一共有27个,其中只有一个(B228)才出土了随葬衣物疏。在隋唐交替时期(公历619年)的随葬衣物疏使用了与吐鲁番出土的同时代的随葬衣物疏相似的文言,那么,可以推断,高昌国统治

下的吐鲁番和中国管辖下的敦煌虽然是不同的地域,但是,通行的是同样的信仰和葬礼制度<sup>②</sup>。

众所周知,莫高窟最初的开凿是4世纪后半叶的“五胡”时代的事。但是遗憾的是,那个时代的窟在莫高窟北区并不存在。因此,根据包括北区在内的莫高窟出土文物,我们还无法确认,在这个时代敦煌是否也和吐鲁番一样流行把随葬衣物疏一起埋葬的信仰和葬礼。但是,如所周知,敦煌周边有很多古墓群。离莫高窟最近的是新店台古墓群(DXM,敦煌郡效谷县),与之相邻的是佛爷庙湾古墓群(DFM,敦煌郡敦煌县东乡),接着有与它们相对的、处于街道两旁的祁家湾古墓群(DQM,敦煌郡敦煌县都乡、西乡)等等。人们已经对任何一个古墓群都进行了发掘研究,以考查从3世纪后半叶到5世纪前半叶的墓葬情况,尤其是对最后的祁家湾古墓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sup>③</sup>。但是,在任何一个古墓群中都未发现任何形式的文字资料,无论是纸的,还是竹简的或是布帛的。当然,不能因此就断定说这意味着这里缺乏信仰和葬礼。似乎仅有一点是清楚的:在4世纪后半叶莫高窟开凿的时候,随葬衣物疏这种做法在敦煌还未普遍流行开来。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写在小的壶形或钵形陶器上的“镇墓文”是“五胡”时代的敦煌给被葬者的镇魂物。这种镇墓文始于后汉时代,流行于洛阳和长安等华北中心地带,到了3世纪开始向河西地域及其周边地区普及<sup>④</sup>,但是,在敦煌所发现的不仅在器形上独特,而且尺寸也特别小,埋葬的数目也很特殊<sup>⑤</sup>。

在整个“五胡”时代,无论是敦煌还是吐鲁番,大体上都在如下一系列政权的统治之下:前凉→前秦→后秦→后凉→北凉→西凉→北凉。然而,即使在相同的政权统治之下,这两个地域也遵循着完全不同的信仰和丧葬制度。一般认为,吐鲁番盆地中高昌郡的设立是由于“五胡”时代的4世纪前半叶河西地域的人口流入所导致的<sup>⑥</sup>。但是,敦煌来的移民们的镇墓文所象征的信仰和葬礼并未传入吐鲁番。或者说,敦煌来的移民是移民全体中的少数势力或后发势力吧?至少,在信仰和葬礼这些方面,我们不得不这样认为。

然而,在“五胡”时代对支配河西地域的前凉以下诸凉政权积极支持的是敦煌以西(包括敦煌)的名门望族们<sup>⑦</sup>,以敦煌为据点成立的西凉政权是他们存在的象征,而另一方面,河西地域东部的名门望族们自

从前凉政权成立以来就反抗该政权，至少一直都是以敌对的态度对待它的。关于其因由，人们做过各种猜想。一个原因大概是：在此地域东部，华北的中心地带来的移民和流民涌到了这里，为了收留他们，各地都建立了侨民郡县。侨民郡县不仅出现在河西地域，连黄河干流以及湟水流域等许多地方都大量出现过<sup>③</sup>。所以，虽然我们也许不能仅仅强调这一个事实，但是，也许可以这样说：侨民郡县的建立造成了与河西东部一代的基层社会的摩擦，其中一个结果就是以基层社会的政权的姿态出现，另一个结果就是造成了新的人口流动。这里所说的流动指的是该地域的基层社会的成员们向西方的流动。我们目前还不能说这次流动是以吐鲁番为主要终结点，因此，我们希望今后能通过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以及雅尔湖古墓群出土的麹氏高昌国时代的墓碑分析等途径来逐步解决这个疑问。

那么，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的“五胡”时代的墓葬中含有一些壁画墓。众所周知，即使在河西地方，从魏晋时代到“五胡”时代，人们也造了许多壁画墓和砖画墓。在河西地方，嘉峪关的新城古墓群以及酒泉的西沟古墓群（酒泉郡禄福县）、高台的骆驼城古墓群（酒泉郡表民县）、永昌的东四沟古墓群（张掖郡番和县），砖画墓的画像砖的主题是现世的日常生活的各种场面，而在上述的敦煌古墓群中，墓室的入口处的门楼上方，画像砖画的是各种各样的神兽，包括四神<sup>④</sup>。换言之，画像砖的主题也说明处在河西地方的敦煌的信仰和葬礼的独特性。

将这一点记在心里，再重新研究一番吐鲁番的壁画墓，我们发现，这里所描绘的内容和嘉峪关以南各地的砖画墓所描绘的一样，都是生活图景<sup>⑤</sup>。这里也得承认敦煌和吐鲁番之间确有差异。

可是，最近在吐鲁番更西的地方——库车——发掘的“五胡”时代的墓葬中的画像砖（浮雕）却和敦煌的古墓群相同，都是嵌在门楼的上部，都有神兽的主题<sup>⑥</sup>。虽然被葬者的出身民族等不详，但是完全可以有理由推断，在“五胡”时代，汉族在西方的扩张已经越过了吐鲁番，达到了库车这个地方。

另外，根据画像砖的主题以及墓内的位置等来判断，他们在河西地方也主要是从西部的敦煌来到此地

的。当然，也不是说从敦煌到西方进行的流动都以库车为目的。根据吐鲁番的古墓群出土的墓表的内容来判断，在吐鲁番定居的敦煌人也是各处散居的。

本文的讨论虽然脱离了文献和文书，但是，可以作为今后的课题而记载下来，并以此结束本文。

作为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最新成果的图录本<sup>⑦</sup>已经把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为首的吐鲁番各地的古墓群出土的文书汇集到了一起。同时，交河故城内的寺院出土的文献（写经）也被收录于此。当然，吐鲁番寺院出土的文献早就为世人所知，而笔者还在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以及德国柏林的国立图书馆里看到过很多写经类文物的藏品。但是，它们大多都是很小的断片，而且似乎并未被整理成目录。

在本文收笔之时，我们希望，今后专家们能借新版图录出版之契机把寺院之类遗址出土的写经类的文物进行比较和整合。

注释：

- ① 关尾史郎：《随葬衣物疏与镇墓文——寻求新的敦煌吐鲁番学》，《西北出土文献研究》第6号，2008年，第5—25页。
- ② 关尾史郎：《莫高窟北区出土〈大凉安乐三年（619）二月郭方随葬衣物疏〉的两三个问题》，《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1—122页。
- 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 ④ 关尾史郎编《中国西北地域出土镇墓文集成（稿）》，新潟：新潟大学超域研究机构，2005年3月。
- ⑤ 关尾史郎：《敦煌的古墓群与出土镇墓文》（上、下），《资料学研究》第4号，2007年：横15—31页；第5号，2008年：横1—16页。
- ⑥ 关尾史郎：《在古代中国的移动与东亚世界》，《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19卷·移动与移民，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第225—253页。
- ⑦ 佐藤智水：《从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时代》，榎一雄编《讲座敦煌》第2卷·敦煌的历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第39—98页。
- ⑧ 关尾史郎：《南凉政权（397—414）与徙民政策》，《史学杂志》第89编第1号，1980年，第42—63页。
- ⑨ 关尾史郎：《对甘肃出土魏晋时期画像砖与画像砖墓的基础整理》，《西北出土文献研究》第3号，2006年，第5—26页。
- ⑩ 町田隆吉：《吐鲁番4—5世纪古墓所出纸画和墓室壁画》，《西北出土文献研究》第5号，2007年，第27—58页。



⑪于志勇、吴勇、傅明方:《新疆库车县晋十六国时期砖室墓发掘》,国家文物局主编《200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第92-98页。

⑫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 敦煌吐鲁番学与内陆欧亚学

李锦绣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偶然发现,使埋藏近千年的文物典籍重见天日,震惊了全世界。东起中国、日本,西迄法国、英国、美国,各地学者均投入对敦煌遗书的研究之中,从而形成了世界性显学——敦煌学。

敦煌遗书发现的消息,引起了一些正在我国西北活动的外国探险家的注意。1907年,斯坦因首先来到敦煌莫高窟,通过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劫走13000余卷写经及其他文物。写经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以同样的方式劫走7000余卷写本和刻本,现藏于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次年,我国学者得知敦煌遗书外流的情况,敦促清政府立即采取保护措施。1910年,清政府下令将藏经洞文献运往北京,但由于王道士的私藏和参与官员的盗窃,敦煌文献仍有外流。1912年和1914年来到中国的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1914年来到敦煌的俄国人鄂登堡、英国人斯坦因,均分别劫走了一批宝贵文书。日人劫走及以后购买的文书现藏龙谷大学图书馆和京都有邻馆等地,俄人劫取敦煌遗书虽稍后,但数量较多,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分所。外国人劫余尚存遗书近万卷,现藏北京中国国

家图书馆。此外,德国、丹麦、瑞典、芬兰、美国等国及敦煌研究院、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大连博物馆、北京大学及港台等地,也有数量不多的收藏。

吐鲁番文书的发现较敦煌遗书更早,1898年,俄国人克列门兹从吐鲁番地区的哈喇和卓墓地盗走了一批古代文卷写本和铭刻。1902年后,德国人克伦威德尔等先后三次在吐鲁番劫走文书、经卷和文物,其中文书10000多件,现藏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大谷探险队也于1902、1912、1913年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发掘,盗劫了约7000余件文书,现藏龙谷大学图书馆。鄂登堡与斯坦因也在吐鲁番地区进行了盗劫活动。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斯文·赫定联合组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次年开始中国学者对吐鲁番地区的第一次考察,发掘了一批宝贵的吐鲁番文书,这是我国最早的吐鲁番文书收藏。从1959年开始,在国家资助下,对吐鲁番古墓群进行了有计划的考古发掘,至1975年,对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共发掘13次,其中从203座墓中出土文书2千余件,现藏新疆博物馆。吐鲁番文书的大量发掘,成为中外学术史上的大事,也改变了敦煌文书独受重视的现状,使吐鲁番文书具有了与敦煌文书相提并论的地位,因而形成了新的学科——敦煌吐鲁番学。

敦煌遗书约50000余卷,内容涵盖古籍、宗教、文学、史学、哲学、艺术、民族、地理、风俗、经济、财政、政治、军事、语言、声韵、中西交通、医学、建筑、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等诸多领域,包罗万象,极为丰富,被称为“学术的海洋”、“百科全书式的宝藏”。吐鲁番文书也有万余件,但较为零碎,很长的、完整的经卷较为罕见。由于保存大量的官府档案,从展示唐代历史的角度而言,吐鲁番文书更加珍贵。

20世纪初,四大考古发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研究,它们是: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明清档案和敦煌吐鲁番文书。对隋唐五代历史研究而言,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敦煌吐鲁番文书不但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初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丰富了这一阶段的历史,使唐史研究向更广阔更纵深的方向发展,而且,由于深

藏于地下千余年的官府档案及民间文献的发现,为中国中古史学提供了全新的内容,更新了史学界对隋唐五代历史面貌的认识,开创了中国中古史学研究的新局面。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史籍文献相结合,成为20世纪唐史研究的重要时代特点。

目前,以出土敦煌吐鲁番文书为基础形成的敦煌吐鲁番学正处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之中。敦煌吐鲁番学对于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毋庸赘述。这里,笔者只想就敦煌吐鲁番学和内陆欧亚学的关系简述如下。

本文所谓“内陆欧亚”(Eurasia),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伏尔加河、多瑙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自古以来繁衍生息着无数的民族,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文化。这是一个种族、语言、文字、宗教、生产、生活方式千差万别的地区。

主要由于游牧民族、特别是所谓骑马游牧民族迁徙、征服、贸易等活动,古代内陆欧亚形形色色的民族及其文化、经济、政治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同样主要由于游牧民族的活动,欧亚草原文化与周邻诸文化(汉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关系,并深深地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有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随着国内外中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亚史的研究必须与整个内陆欧亚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一个专门的学科——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

内陆欧亚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

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特别是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它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尤其是其核心地带)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

内陆欧亚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绿洲和游牧。过去囿于资料,有关研究无法深入,正是因为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田文书和佉卢文书等出土文书的问世,这方面的研究才得以深入。其中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进行的研究对于探究整个内陆欧亚绿洲和游牧这两种生产和生活方式本身,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上层建筑,特别是两者之间互动的形式及影响,有着无法替代的示范意义。

中国吐鲁番学的前辈和奠基人马雍先生的名篇《突厥高昌始建交考》<sup>①</sup>,便是利用出土文书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取得开创性成就的典型。

内陆欧亚学的另一主题是内陆欧亚游牧民族的迁徙。这是一个内陆欧亚史上的经典课题。敦煌、吐鲁番自古以来就是欧亚交通的枢纽,也是历史上各游牧势力的必争之地。毋庸置疑,研究这个课题离不开敦煌吐鲁番文书,离不开已有敦煌吐鲁番学的成果。

内陆欧亚的其它课题,譬如内陆欧亚民族的渊源似乎与吐鲁番文书没有直接关系。但敦煌吐鲁番地区古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十分明显,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对于敦煌吐鲁番学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推而广之,内陆欧亚各种研究课题取得的进展,对于敦煌吐鲁番学的进步均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历史上,内陆欧亚许多民族的兴衰存亡、发生的许多事件在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变化。不仅仅研究内陆欧亚任何局部(如中亚或东北亚)的历史文化必须具有内陆欧亚的视野,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如欲更上层楼,也必须有内陆欧亚的视野。

陈寅恪先生是敦煌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他不仅为最早提出“敦煌学”一词的学者之一,而且身体力行,对敦煌文书进行了系统研读和深入探讨。他

以对佛经的精熟<sup>②</sup>及左右逢源、触类旁通的中亚文字功夫,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佛经及佛经翻译作品对演说经义的文学作品的影响<sup>③</sup>,不仅较罗振玉等据传统史籍考证佛曲更上一层,而且与东西洋学者相较,亦站在世界前列。这里只举他对《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及莲花色尼出家因缘的考证。比较敦煌汉文写本《金光明经》及其突厥文本、梵文本、藏文本、蒙古文本等的内容,寅恪先生指出,佛经首冠感应冥报,为西北昔年之风尚,《金光明经》之所以流传独广,是因为其义主忏悔,最易动人,佛教入中国后,冥报传,也从佛典附庸,演变为小说文学的长篇巨制<sup>④</sup>。寅恪先生通过对欧亚多种文字写本的精确比勘,考释佛经内容、流传迹象,进而探讨佛经对文学的影响,如剥芭蕉,层层深入,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也奠定了寅恪先生为比较文学研究先驱者的地位<sup>⑤</sup>。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还有他的《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sup>⑥</sup>一文。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记载了莲花色尼六种恶报,寅恪先生根据巴利文写本,指出敦煌本删去了莲花色尼与其女共嫁一夫,其夫即其所生之子的恶报。究其原因,是因为这种恶报与华夏民族传统伦理观念不相容,而佛教传入中国时,佛教教义中与中土社会组织及传统观念相冲突者,教徒多采取隐秘闭藏、禁其流布的方式,将莲花色尼七种恶报删去一种,即显著一例。寅恪先生的论述,高屋建瓴地揭示了佛教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此二文均出入文史,贯通儒释,沟通中外,而所以能如此,其原因之一,是寅恪先生具有欧亚学的视野。自少年起,寅恪先生“廿载行踪遍五洲”,力学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土耳其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朝鲜文、佉卢文、印地文、伊朗文、希伯来文等近二十种中亚西域及东方民族文字。从遗存笔记本看,他对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巴利文等致力尤勤<sup>⑦</sup>。在欧洲、北美,他承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蔚为大宗,风云际会之际,吸收西洋学者治东方学精华,更辟天地,在清末西北史地、佛典翻译基础上扩大视野,层楼再上,使传统的史学、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体现了古代欧亚文本解读及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世界先进水平。

寅恪先生多次强调,“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

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sup>⑧</sup>。因而留滞海外数十年,对西洋学术的锐进及日新月异有切身理解和体会,力学其所长。但他治学并不是盲目步西洋人后尘,而是在吸收输入外来学说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寅恪先生所开创的,正是中国内陆欧亚学及敦煌吐鲁番学的新风气,而其融汇中西所创长编考异之法,又是为中国内陆欧亚学及敦煌吐鲁番学治史者所辟的一个新途径。

著名古文字学者唐兰先生曾说:古文字学的功夫在古文字学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敦煌吐鲁番学的功夫在敦煌吐鲁番学之外。那么究竟应该在哪里下功夫,我认为首先应该在内陆欧亚学上下功夫。敦煌吐鲁番学和内陆欧亚学可以说是天然盟友,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

总之,内陆欧亚学因敦煌吐鲁番学的兴起而切实提高,敦煌吐鲁番学因内陆欧亚学的开展而发扬光大。愿这两个领域的学者精诚团结,努力合作,不断开创这两个学科的新局面。

注释:

- ①见《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46-153页。
- ②如从《贤愚经》、《杂宝经》找出敦煌佛经讲唱文学依据,见《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71-174页。
- ③见《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金明馆丛稿二编》)。参姜伯勤:《陈寅恪先生与敦煌学》,《广州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 ④《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6-257页。
- ⑤钱文忠:《略论陈寅恪先生之比较观及其在文学研究中之运用》,《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75-505页;袁荻涌:《陈寅恪与比较文学》,《文史杂志》,1990年第1期。
- ⑥《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1-156页。
- ⑦季羨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4-84页。
- ⑧《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8页。



## 敦煌吐蕃文化研究前景广阔 ——“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启示

马 德

(敦煌研究院 文献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30)

2008年8月1日至6日,敦煌研究院在敦煌莫高窟举办了“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敦煌历史上,也是藏族历史上,更是国际学术界第一次以敦煌吐蕃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各地的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提交了论文。会议回顾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敦煌吐蕃文化研究的成就,分别从敦煌与藏族早期历史及原始宗教、敦煌与吐蕃历史、敦煌吐蕃石窟和藏地佛教艺术与考古、敦煌吐蕃文献、敦煌吐蕃文化综合研究等五个方面作了深入的讨论,解决或初步解决了敦煌学、藏学、民族学、语言学、佛学等相关学科领域内一系列重要而有意义的问题,同时在一些领域有了重大发现和突破。这次会议为我们展示了敦煌吐蕃文化研究的广阔前景。

敦煌与藏族早期历史及原始宗教研究,主要是利用敦煌文献中的象雄语、苯教文献,对藏族早期历史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国内外藏学界百年以来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成果丰硕。这次会议上,学者们在回顾以往研究成就的基础上,指出了前人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又从敦煌藏文文献中挖掘出一些吐蕃原始宗教和自然崇拜方面的资料进行阐述;更为重要的,康巴地区一直保存着较多的藏族原始宗教(多为苯教)的遗迹遗物,近年来在西藏地区又发现大量的苯教遗迹和文献,在这次会议上都得到广泛深入的讨论,使藏族早期历史的研究工作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足以改写藏族历史。

敦煌与吐蕃历史的研究,一直是百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最活跃的研究课题。国内外对吐蕃历史的系统研究,实际上也就是从敦煌藏经洞文献面世之后开始的;吐蕃时期的敦煌石窟和敦煌藏文文献是记录反映吐蕃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以往所有的研究都表明了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在吐蕃历史文化

研究方面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这次会议向我们展示,敦煌藏文文献和敦煌石窟资料在历史文化的研究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地仔细调查、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以便更深刻地认识吐蕃历史文化的本来面目。敦煌吐蕃时期的石窟艺术,历来是敦煌石窟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这次会议上有几篇关于吐蕃时期石窟个案的研究,无论理论和方法,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突出的创新,也为今后相关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特别是会议上公布的藏地佛教艺术与考古的研究成果,展现了鲜为人知的西藏西部佛教石窟艺术的风貌,对敦煌石窟中相关内容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意义。

敦煌吐蕃文献的研究,是这次研讨会的重点议题。目前国内外所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总数已近15000多件,其中海外8000多件,国内甘肃以外各地(含台、港地区)共300余件,甘肃省内藏6600余件。百余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和研究过的仅千件左右,主要在社会文书和佛教史传类文献方面。而大量的佛经和佛教文献都没有得到重视和研究。敦煌藏文文献与汉文文献一样,绝大部分是佛教文献,而佛教文献中绝大部分是佛经。百余年的研究工作也大致相似,佛经和佛教文献的研究方面十分薄弱。法藏敦煌文献已经公布的2200多号藏文文献中,1299号以后的基本上是佛经和佛教文献,而这一部分文献基本上没有人进行过研究;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也基本上没有进行过研究。因此,敦煌吐蕃文献的研究可以说是才重新起步,有如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的敦煌汉文文献的研究,随便选取一份文献,甚至一个名词,一个专题等,都可以进行研究(实际上这种方法我们现在还在使用)。当年我们作汉文文献,一起步就显示出中国学者研究自己母语比外国学者明显的语言优势。研究藏文文献也是一样,无论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还是前人没有涉足过的领域,藏族学者都表现出研究自己母语的独特优势。会议上有关藏文佛教文献的研究,藏文写经中的报废经页的研究等,都让人耳目一新。另外,会议上在对国内外以往的研究(包括一些权威性的研究)的不足和失误方面的评议和指正,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同时,会议上还将建立吐蕃写本研究的文化体系定向问题重新特别提出,吐蕃文献浩如烟海,建立自己

的文法体系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需要。关于敦煌吐蕃时期汉文文献的研究,以往也有大量成果,而以后无论是佛教文献还是社会文书,都需要与藏文文献的结合研究。而且,敦煌吐蕃文献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无论是对敦煌吐蕃时期历史的进一步研究,还是对吐蕃时期的敦煌石窟研究的深入,都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和意义。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进行大吐蕃文化的研究,也是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新课题。敦煌文献中,也有一些记载吐蕃时期所占领的中国西南、西北广大地区及中亚地区的情况。吐蕃最强盛时期,统治有中国西北、西南以及中亚的大批疆土。敦煌之外,青藏作为吐蕃本土保存了比较多的遗迹,而西南地区现存的遗迹也为数不少,但对这方面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也是刚刚起步。当然,在敦煌吐蕃文化方面还有许多尚待研究的课题,这次会议上也只是涉及了一部分,更多的研究领域还有待开拓。

这次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也为笔者个人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几年,由我主持的《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整理研究》先后被列为敦煌研究院重大课题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在从事这个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根据自己掌握的敦煌藏文文献和敦煌吐蕃时期的石窟以及百余年来国内外研究状况,对敦煌这一地区在吐蕃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在这次研讨会上,我发表了《论敦煌在吐蕃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一文,基于敦煌吐蕃历史文化遗迹遗物以及前人研究成果,从敦煌历史文化底蕴对吐蕃的影响、吐蕃在敦煌的政治制度、吐蕃封建经济的确立、以译写佛经为主要内容的佛教文化事业、吐蕃史传在敦煌编纂及其意义、敦煌石窟与吐蕃佛教文化、吐蕃在敦煌的文化交流、吐蕃统治对周边及后世的影响等方面作了论证,提出了敦煌曾经一度成为吐蕃的文化中心的论断。特别指出吐蕃在敦煌完成了封建经济改革和封建化过程,吐蕃时期在敦煌抄写了大量佛经并运往吐蕃本土及统治区各地,吐蕃灭亡后及统治敦煌结束后汉蕃各族文人仿效唐朝的官修史志制度在敦煌编纂吐蕃史志三个方面的史实和意义。令我特别激动和兴奋的是,在这

次会议上,西藏大学图书馆的西热桑布先生发表了《卓卡寺所藏吐蕃时期〈喇蚌经〉之考》,公布了西藏山南隆子县卓卡寺新发现吐蕃时期的《喇蚌经》,即吐蕃热巴巾和朗达玛时期的赞普御用经书,内容为《十万般若颂》,我一眼看出《喇蚌经》与敦煌藏经洞所出藏文写经《十万般若颂》在纸质、尺寸、书写格式、装帧形式等各方面的一致之处,认定《喇蚌经》就是在敦煌抄写后运到西藏供奉给赞普的。因为在此之前,我在《论敦煌在吐蕃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的演讲中,根据敦煌方面的记载,已经论及吐蕃时期在敦煌抄写了大量佛经并运往吐蕃本土及统治区各地,经核对,《喇蚌经》除上前述与敦煌写经的一致之处外,更重要的是部分写经校经人名题记与敦煌博物馆及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经完全相同;进而通过对敦煌市博物馆藏《十万般若颂》的考察,与会的汉、藏族学者们都赞同或默认了我的这一推论。因此,《喇蚌经》是西藏发现的吐蕃时期的敦煌写经,它是唐代吐蕃和敦煌历史上汉藏民族文化交流以及敦煌在吐蕃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的历史见证,无论对敦煌研究还是吐蕃研究,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研究,都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另据透露,西藏首府拉萨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和山南地区桑白县的巴郎却康、洛扎县的色卡古托寺等处也保存有吐蕃时期的写经。西藏保存了一千多年前的敦煌写经,这就从空间上为敦煌吐蕃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另外,我在多年从事敦煌石窟营造历史的研究中,对敦煌晚期石窟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敦煌石窟的晚期,由于西藏后弘期佛教的兴起和广泛流传,给徘徊二百多年的敦煌石窟营造,展现出一个崭新的时期,石窟艺术重新焕发了青春,莫高窟和榆林窟、安西东千佛洞、五个庙等地的西夏、蒙古和元代的壁画,可以说是敦煌佛教壁画的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时期。而这一切都有赖于藏传佛教艺术所注入的活力,我称之为敦煌石窟营造史上的复兴时期,并写进了2002年出版的《敦煌石窟营造史导论》,但因资料所限,对这一问题并未做出深刻的阐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近年在西藏西部的石窟艺术的研究和介绍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次敦煌吐蕃文化

学术研讨会上,他们发表了这一方面研究的新成果,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敦煌石窟晚期的艺术提供了很大帮助。西藏西部的佛教石窟艺术,展示了与敦煌晚期石窟艺术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使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与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到一起,这是敦煌吐蕃文化的延续。如果说,敦煌石窟在她的最

盛期,迎来吐蕃对敦煌的管辖,因而对吐蕃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到敦煌石窟濒临衰竭的晚期,是吐蕃的佛教艺术反哺敦煌,给了敦煌石窟艺术新的活力!这就又为我们从事敦煌学研究和藏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本组稿件的组稿、审稿,得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刘进宝教授大力支持)

### The Study of Dunhua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bstract :** It has become a cosmopolitan subject of Dunhuang Studies with the discovery of the texts by Taoist Wang 100 years ago, along with the spreading of the documents found. In the present journal, there have been five experts invited at home and abroad to present their ideas of the researches of the topic. Mr. CHEN Xilian thinks it is urgent to formulate the theories of the subject; Mr. ZHAO Heping suggests there should be more world-wide cooperation among scholars of the field and more attention on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achievement of Dunhuang Studies; Japanese scholar, Mr. SEKIO Shiro advises further researches on religion and customs based on newly discovered relic from Turpan and Kuqe; Mr. LI Jinxiu believes that more studies on Inland Eurasia can be carried out with much Dunhuang texts found; Mr. MA De asserts that more studies be done on topics of sutra and Buddhism.

**Key Words:** Dunhuang studies; history; present; future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李蕾]